

## 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 推进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推进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5月26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学思用”理论座谈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

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座谈会上，12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交流心得体会，发表真知灼见。本报摘编其中5位学者的发言，与读者共享。

## 立足中国的伟大实践全面推进理论创新

■姜义华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立足中国14亿人的伟大实践，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学说、劳动价值学说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新，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理论总结。

19世纪，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作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者诞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以来，在相距万里之遥的东方，在资本主义发展非常鲜艳的中华文明大地上，竟开出了绚烂的鲜花，结出了累累硕果。马克思主义启迪了中华文明批判性地重新认识和重新估定自己，激活了中华文明潜藏在自身深处的巨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而中华文明则通过艰难而百折不挠的探索和十四亿人共同参与的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所发现的科学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历史唯物主义真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部分上升到全体，

从若干环节上升到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机蓬勃地从19世纪、20世纪走向21世纪。

中国学人当今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立足中国人民百年来艰苦卓绝的伟大实践，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如何实现了一次次历史性的重大突破和发展。

首先，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终于可以说清楚了。我们经过艰难的反复探索，终于真正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先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超越了俄国当初试图直接过渡到实行共产主义生产与分配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确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都要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也表明，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而是一个将延续几代、十几代甚至更长时间的全新的社会形态。尽管我们自己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上，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创举，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多么重大的突破性发展。

其次，关于劳动价值论。数以亿计长时期来一直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农

民小生产者，只用了差不多一百年时间，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农业和手工业小生产转向以机器大工业和信息革命为主导的社会化大生产，从自然经济转向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在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和世界联系的基础上，在社会生产力高速、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劳动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人这里，逐步从以往的谋生手段，转变为提升和实现人的文明程度、生命价值的创造性的自觉需要。脑力劳动愈来愈重要，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劳动自身的这一飞跃，给土地、资本这些生产要素注入了全新的内涵，推动了土地和资本本质与功能历史性的飞跃。在全世界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工业革命历史或世界各国各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伟大创举，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突破性的重大发展。

再次，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如此巨大人口的社会实践，最为雄辩地说明了什么是真正以人为主体，真正具有能动性、社会性的人为主体，真正以最广大的民众为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就是要求每个人都在直接世界联系中，在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审美体系、情感体系诸方面全面提升自己的

文明素质。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共同富裕，更是精神生活方面的共同富裕。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始终不渝地推动人最终脱离动物状态，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的人的生存条件，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在中国正在逐步成为生活的现实。这无疑更是人类成长为真正的人这一历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的普遍实践中的一次大的飞跃。

由此可见，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要认真地研读马克思本人的全部著作，了解他如何锲而不舍地探求客观真理，更要立足中国14亿人的伟大实践，理直气壮地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和新的理论总结，使马克思穷毕生之力所揭示的真理，得到丰富，得到充实，得到补正，从而获得更为强大的新的生命力，尤其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一般原理具体化为符合中国实际和现今世界实际的基本制度、行动纲领、行为准则、思维方式。这样去做，方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名副其实地成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华文明成为代表21世纪的文明。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系教授）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  
时代任务——摆脱学徒状态  
获得自我主张

■吴晓明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是一些具有中国元素或中国色彩的学术，而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的学术。只有这样的学术才称得上自主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具有自我主张的学术大体上以两个特征为标志。从形式上来说，它是讲中国话的。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在哲学上并没有太大的创造，但黑格尔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因为他第一个用德语写哲学，“他开始使哲学讲德语”，此后才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繁荣。从理论的实质方面来讲，自我主张的学术必须能够摆脱外在反思的思维模式，从而能够真正深入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就意味着从外在反思中摆脱出来，从而能够深入于特定社会的实质性内容之中，特别是能够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绝不意味着拒绝对外学习，自我主张的学术是要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

的和批判的，也就是说，成为立足于自身之上的。这需要经过“文化结合的锻炼”。黑格尔在讲到古希腊文化的创造时说，古代希腊人既有自己的传统，又面临着当时更加强势、更加优越的东方文化；正是因为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希腊人才获得了应有的活力，并开创出他们胜利和繁荣的时代。关于这一点，尼采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希腊人一度似乎要被外来的文化压垮了，他们的宗教几乎就是各种东方宗教的一场混战，有埃及的、巴比伦的、吕底亚的、闪族的。但希腊的文化终于没有成为机械性的文化或装饰性的文化，因为他们牢记了德尔菲神庙“认识你自己”的格言，他们由此获得了文化上的自我主张，从而整理好“那堆外来的杂物”，而没有长久地做东方的追随者。事实上，中国在历史上也经历过这种文化结合的锻炼，即佛教的中国化。这一点对于当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来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

## 构建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道路底层逻辑

■张维为

“文明型国家”叙事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知识、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虽然存有争议乃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的叙事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学者想绕也绕不过去。

在长期从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话语的研究中，我通过对不同文明和国家的广泛考察和比较研究，得出一个慎重的结论：中国已经通过长期不懈的探索，成为一个把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并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我把这样的国家定名为“文明型国家”，英文叫civilizational state。我于2010年正式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

十多年前，西方学界和媒体对于“文明型国家”话语基本持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今天情况完全变了。随着非

西方世界的崛起，俄罗斯、印度、伊朗、土耳其等非西方大国都公开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尽管对定义存有一定争议，但他们的主张中有一共同之处：他们都反感西方的说教和干涉内政，都强调我们是独特的文明，请尊重我们，先管好你自己。美国《经济学者》杂志2020年刊文惊呼：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将会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美国《国家利益》2022年刊文“文明型国家的魅力”。美国人文思想杂志《Telos》最新一期的专题是：文明型国家与自由主义帝国。英国作家Aris Roussinos甚至模仿《共产党宣言》的开篇这样写道：“一个幽灵正在自由主义的西方徘徊：‘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换言之，文明型国家话语今天已经走出学术象牙塔，已经成为对全球政治叙事和战略选择产生相当影响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

那么这些代表西方思想界风向标的刊物为什么那么关注文明型国家叙事呢？我自己关于文明型国家论述中被外界引用最多的两段话，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第一段话是“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

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这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可能颠覆西方“自由主义元叙事”，从不存在什么“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终结的终结”。各国人民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民情国情和文化历史传承探索自己的成功之路，包括借鉴别人的经验，这才是人间正道，或者叫“文明型国家的元叙事”。

第二段话是“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通过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望”。这意味着文明型国家叙事，对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元叙事，是一种“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文明型国家”，它甚至可能是更高层次的国家和更高水准的政治制度。

换言之，“文明型国家”叙事作为一种相对完整的话语和知识体系，为

中国道路构建了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所以它可以全面地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同时强势回应西方话语对中国道路的质疑，并从中国标准出发对国内外许多事件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今天我们的“文明型国家”叙事已经是一个包括政治叙事、文化叙事、现代化模式叙事、国际制度比较叙事等的比较完整的一个话语和知识体系，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知识、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虽然存有争议乃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的叙事今天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学者想绕也绕不过去，而我们可以随时与他们进行开放式的讨论或辩论。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有三点思考：一、跳出单一学科思路，走向综合、跨学科的底层逻辑研究；二、要有宽广的国际视野，研究成果面向世界；三、“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以引领整个世界为目标，以中国崛起为强大后盾，脚踏实地工作，摒弃形式主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进步事业不懈奋斗。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面向未来的全球  
科技创新治理——构建科创治理  
自主知识体系

■陈强

新形势下的科技创新治理面临一系列新的变化。

一方面，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处在重大密集性突破的前夜，复杂程度和难度越来越高，非线性特征愈加凸显，对于协同的范围、规模和深度提出更高要求；科技竞争加速移向最前沿，逐步演变为系统之间、生态之间的角逐，亟需完成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的建构，形成更具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科学研究范式快速迭代升级，趋于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社会化，必须考虑如何加快条件和能力建设，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在提高治理站位的同时，降低治理重心，为策源性成果涌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全球创新格局加速重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倾向迅速抬头，正常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严重受阻。这些情况对于科技创新治理不断形成新的压力和挑战，要求在知识供给方面体现出更高的响应质量和效率。

长期以来，与基础研究陷于“两头在外”困境相类似，科技创新治理知识体系也存在自主性偏弱的问题。在开辟研究领域、设置新议题、提出标志性概念、阐发原创性理论、开发新型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发布高水平研究成果等方面，科技创新治理领域的知识生产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外依赖。在内外环境易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逐步加剧的背景下，无论是解释当下日新月异科技创新治理实践，还是指导和引领未来的治理实践发展，现有的知识供给模式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必须加快构建面向中国科技创新治理实践需

求的自主知识体系。

首先，要树立构建科技创新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信。近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十分活跃，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形成了一批开展持续、稳定、有特色研究的机构和团队。另外，中国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创新热点区域，科技创新治理的知识需求旺盛，场景资源丰富。这些都是实现知识体系自主性可以依托的基础性资源；其次，要集中优势研究力量，推动学科交叉，瞄准世界科学前沿，对国家战略需求，针对科技创新治理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开展有组织的原创性研究；再次，应面向丰富多彩的中国科技创新治理实践，加强对其场景特征的分析 and 提炼，挖掘本土化的标识性概念，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模式和叙事方式；第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提升科技创新治理研究的生态位势，必须加快建设国际学术组织、高端论坛、高水平学术期刊等高等级学术平台。同时，依托人工智能、数字化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推动研究范式的迭代升级，开发新的分析工具，不断完善治理研究的数据库及案例库；最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应坚持开放性，与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结合起来，与外部进行高水平的信息和能量交换，为体系构建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同时，着力推动治理思想和治理理念的国际化传播，为面向未来的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做出中国贡献。

（作者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特聘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 扩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苏长和

中为外用的知识生产和传播，会对中国当代学者产生倒逼机制，倒逼学者将我们成熟的有影响的社科理论在同别国具体实际结合过程中走出去，从而进一步扩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当今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格局正在发生变动。作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代表之一，建立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世界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社会科学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对外交流和传播，是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今后一段时间国际化的重要

任务。让外部世界了解、学习、借鉴、使用中国社会科学知识，对于扩大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力，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的学术和舆论环境，有紧迫的意义。

理论要做到胸怀天下，就要研究自己以及自己和别人的共同问题，形成解释框架，这套解释框架如果能对别人产生启发，并能被别人所用，就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力。

要做到这点，首先是一套关于自身以及自身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解释系统，也就是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国际关系、公共管理是有自己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的，形成了由标识性概念、逻辑、原理构成的知识体系，例如天下为公，大一统，政权，代表制，人民共和，人民政府，新型政党制度，民主集中制，政治界别，政治协商，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一国两制，自我革命，协商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

发展规划，举国体制，民生财政，对口支援，小康社会，共同富裕，文明型国家，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其次是要重视将特殊的、具有特色的概念和话语上升为一般概念和表述。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主义的政治学原理，同中国实际和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后，用特殊的、具有特色的概念表述一般政治学知识体系。所以这些看上去特殊的、具有特色的概念，其实很容易还原为一般政治学理论，便于更好地对外传播。例如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看上去是特殊的，其实这五个特征还原为现代化一般理论的话，就是好的现代化的几个标准。我们对外传播好的现代化道路的一般标准，其实就是在内在地传播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

最后是主动学会用自己特色的概念、理论研究别人，或者让别人用中国

概念、理论研究自己，从而使得中国概念、理论逐步在被人用并有所启发和效用中传播出去。

过去我们重视外为中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学习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但是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能够为不少国家提供借鉴，需要我们重视中为外用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机制。

与外为中用相比，中为外用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则是反过来的，就是在对中外实践中抽象出一般理论，这个一般理论同外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同别国实际相结合，在分析、解释别人并在别人使用中，扩大中国知识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这种学术生产和传播会对中国当代学者产生倒逼机制，倒逼学者将我们成熟的有影响的社科理论在同别国具体实际结合过程中走出去。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